

逝去的风韵

杨泓谈文物

杨泓◎著



中華書局

逝去的风韵

杨泓谈文物

杨泓◎著

中華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杨泓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7.3
ISBN 978-7-101-05506-1

I. 逝… II. 杨… III. 文物-中国-通俗读物
IV. K87-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999 号

书 名 逝去的风韵——杨泓谈文物

著 者 杨 泓

责任编辑 娄建勇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½ 字数 16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7-101-05506-1

定 价 36.00 元

杨泓，满族。1935年12月生于北京市。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考古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汉唐考古、中国美术考古和中国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兵器论丛》、《美术考古半世纪——中国美术考古发现史》、《汉唐美术考古与佛教艺术》、《古代兵器通论》等，共发表学术论文逾300篇。

责任编辑：娄建勇 (lly0119@sina.com)
责任美编：刘 丽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生 活

中国古代的名片——爵里刺	(2)
铜博山香炉	(5)
镜奁·镜盒·镜台	(9)
针	(13)
步舆·平肩舆·步辇	(15)
从卫贤《高士图》谈“举案齐眉”	(20)
家具演变和生活习俗	(23)
说坐、跏和跂坐	(28)
屏风	(32)
“屏风周昉画纤腰”——漫话唐代六曲画屏	(39)
帐和帐构	(46)
胡床	(52)
隐几	(58)
古文物图像中的相扑	(61)

马舞与舞马	(66)
宋代市民游艺——京瓦伎艺	(69)

战 争

中国古兵器文物探寻	(76)
威严和权势的象征——钺	(80)
商代的兵器与战车	(83)
剑和刀	(92)
东周的剑栝与剑鞘	(107)
马稍春秋	(111)
说“戟”	(115)
从时迁盗甲谈起——漫话中国古代甲冑	(124)
白马金具装	(139)
古代的砲——发石机	(144)
虎贲·虎符·虎节——与古代军旅有关的虎纹文物	(146)
车战的悲剧	(150)
降魔变绢画中的喷火兵器——探寻古代管形射击火器 发明时间的新线索	(152)
武库和兰锜	(156)
汉魏六朝的军乐——“鼓吹”和“横吹”	(164)

艺 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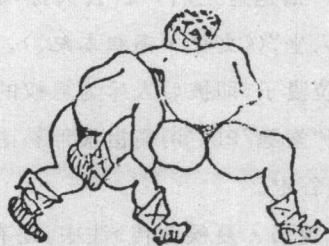
漫谈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花纹带装饰部位	(172)
三星堆铜像	(178)
汉俑楚风	(181)

汉玉新风	(186)
汉代小型雕塑	(189)
中国画像砖艺术的轨迹	(195)
“画鱼捕獭”和三国漆画	(206)
丹阳南朝陵墓石刻	(208)
山东北朝墓人物屏风壁画的新启示	(214)
记柿庄金墓壁画“捣练图”	(218)
跳跃的玉兔——漫话殷代小型动物玉雕	(221)
是何意态雄且杰——中国古代雕塑中的骏马	(225)
骆驼艺术	(234)
记古代滇族动物造型艺术	(239)
从唐墓三彩驴谈起	(244)
一唱雄鸡天下白——漫话有关鸡造型的文物	(248)
天降仙猿	(253)
龙舞晴空	(257)
亥年话猪	(260)
犬文物漫谈	(264)
地下星空	(268)
雷公怒引连鼓辨	(271)
车马坑和殉马坑	(274)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278)
“影塑”和“塔柱”	(283)
金棺银椁瘞“舍利”	(287)
七祖墓塔披露的禅宗秘史	(293)
蓟县独乐寺辽塑十一面观音像	(296)
宁夏五塔	(300)
红莲朵朵出“化生”	(304)

异 域

丝绸之路由中国向日本的延伸	(308)
七子镜	(314)
日本古代的埴轮艺术	(316)
海东文物话寄生	(322)
天马和障泥	(326)
青瓷羊的启示——漫话六朝青瓷羊和百济古坟出土的青瓷羊	(331)
后 记	(334)

生 活



中国古代的名片——爵里刺

现在,世界各国人们在社会交往中,普遍使用名片。其实,我国还应算使用名片最早的国家,古时称它为“名刺”或“谒”,到了明清时期又称“名帖”,一直沿用到解放前夕,就称“名片”了。它像文书的发展一样,最初也是使用竹、木简,以后逐渐改用纸。

至迟到了汉代,名刺已很流行,刺上一般要写明姓名爵里,故又称“爵里刺”。汉刘熙《释名》中解释说爵里刺就是“刺书其官爵及郡县乡里也”。至于下级或晚辈谒见上级或长辈,也可称谒,如果同时送礼,则还要加书所送钱物的数量。这令人想起《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汉高祖刘邦青年时一段耍无赖的故事。

一位有名望的吕公,初迁到沛县时,县令为之请客,并规定送礼不满一千的客人,坐在堂下。当时刘邦是个小亭长,哪里拿得出那么多的礼钱?他故意在谒上写“贺万钱”,实际一个钱也没送。谒送进之后,“吕公大惊,起,迎之门。吕公者,好相人,见高祖状貌,因重敬之,引入坐”(《史记·高祖本纪》)。刘邦原为诈酒食,不料反受吕公赏识,并因此得到了一位妻子,即被后人斥为篡权的那位吕后。对于《高祖本纪》中“乃给为谒”句,唐司马贞“索隐”曰:“谓高祖素狎易诸吏,乃诈为谒。谒谓以札书姓名,若今之通刺,而兼载钱谷也。”

关于爵里刺,在《三国志·魏书·夏侯渊传》注中,还有一则记述其第五子夏侯荣聪慧而记忆极强的故事,说他七岁能作文章,每天读上千言的文章,都能记下来。魏文帝曹丕听到以后,想试一试。一次大会宾客时,百余名客人都按习惯送上奏刺,

刺上各写明其乡邑、名氏。夏侯荣看过这一百多枚爵里刺后，魏文帝让他遍谈各人的爵里姓名，竟然不谬一人，使魏文帝也非常惊讶。

在刺上除姓名爵里外，还常要写有表示客气和问候的话。据《释名》记载：“画姓名于奏上曰画刺，作再拜起居字，皆达其体，使书尽边，徐引笔书之如画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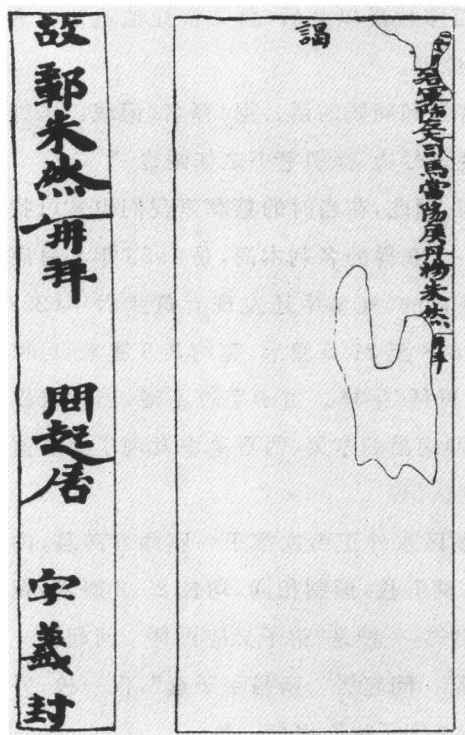
从文献中可知，汉魏时奏刺是流行的习俗，因此，在当时的墓葬里我们也常可找到它们的踪迹。建国以来的考古发掘中，第一次获得的名刺木简，是1955年4月底在湖北武昌任家湾一座东吴时期的砖墓中获得的，在墓中还发现有黄武六年（227年）铅质买地券一方，墓内出土三枚字简，长18.8至21.5厘米，宽约3.5厘米，可惜字迹已湮漫，仅在一枚上可以看出“道士郑丑再拜”字样。由于字迹不清，当时难以确定它即系爵里刺，未受重视。此后，又在江西南昌的东吴、西晋墓中发现了字迹清晰的名刺简多枚，使我们对此有了较为明确的认识。

1974年3月，江西省博物馆在南昌市东湖区永外正街发掘了一座西晋砖墓，内葬二棺，为夫妻合葬。在左侧的男棺中发现木简五枚，形制相同，均长25.3厘米，宽3厘米，厚6毫米，墨书。这五枚木简有三种格式，一种是“弟子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计有三枚；一种是“豫章吴应再拜 问起居 南昌字子远”，仅一枚；另一种是“中郎豫章南昌都乡吉阳里吴应年七十三字子远”，也仅一枚。

1979年6月，江西省历史博物馆又在南昌市内阳明路中段南侧清理了一座东吴墓。墓内葬三人，在其中一棺内出有二十一枚木简，大小相同，长24.5厘米，宽3.5厘米，厚1厘米。上有隶体墨书，文字全相同，为“弟子高荣再拜 问起居 沛国相字万绥”。

从以上三处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对当时的名刺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可以知道一般的爵里刺是在简的开始处写明郡名、姓名并书“再拜”。其间稍空后，再书“问起居”。然后在简的下部偏左侧，以小字注明乡里和本人的字。这就是吴应墓出的第一种名刺和高荣墓出的名刺，也是发现数量最多的一种，大约是平日常用的格式。至于吴应墓所出的第三种名刺木简，加书官职和年岁，且一行直书而下，似是《释名》中所谓的“下官刺”：“下官刺曰长刺，长书中央一行而下也”，则与一般爵里刺稍有不同。

比上述三项更令人感兴趣的发现，是1984年发掘安徽马鞍山东吴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出土的刺和谒（如图）。朱然墓出土的木刺共十四枚，正面直行墨书，刺



文有三种，一种为“丹杨朱然再拜 问起居 故鄣字义封”，一种为“故鄣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另一种为“弟子朱然再拜 问起居 字义封”。木刺长 24.8 厘米，正与同墓出土的漆尺的长度 24.8 厘米相同，说明当时刺长为一尺。与上述其余几座吴晋墓不同，在朱然墓中除名刺外还出有木谒三枚，其长度与刺一样是 24.8 厘米，为当时一尺长，但宽度约是刺的三倍，为 9.5 厘米，系木牍。这也正与《急就篇》颜注牍可以“持之以见尊者”之义相合。木谒居中书一“谒”字，在右侧直书“□节右军师左大司马当阳侯丹杨朱然再拜”等十八字，表明当时谒的一般书写格式，即中央顶端书“谒”字，官职、籍贯、姓名及“再拜”等皆偏书于右侧。据《释名》：“谒，诣也，诣告也。书其姓名于上，以告

所至诣者也。”系下属进谒上级之用。《后汉书·孔融传》：“河南尹何进当迁为大将军，杨赐遣融奉谒贺进，不时通，融即夺谒还府，投劾而去。”正说明谒的使用情况。

除东吴、西晋的刺、谒以外，汉代的谒也有出土。在江苏连云港锦屏镇西汉墓出土的谒，应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标本之一，谒上书文字三行，为“东海太守宝再拜”“谒”“西郭子笔”。

但是还应注意一点，即墓中所放的刺是与迷信有关的，应与当时道教信仰联系在一起。东吴黄武六年墓刺简称“道士郑丑再拜”，高荣、吴应多称“弟子”，是供墓主人在阴间使用的。虽然如此，因为它还是模拟着生前的实用物，其形制、书写格式还是与实际应用的并无差别，仍不失为古代名刺的实物证据。古人为了介绍自己而投送爵里刺的习俗，以后因造纸术的进步而改用纸书，但仍保留着“投刺”一词。

(1982)

铜博山香炉

“洛阳名工铸为金博山，千斲复万镂，上刻秦女携手仙。承君清夜之欢娱，列置帏里明烛前。外发龙鳞之丹彩，内含麝芬之紫烟。如今君心一朝异，对此长叹终百年”。这是一首《拟行路难》，为以气骨劲健、词采华美见称的刘宋诗人鲍照的作品。诗中借博山香鑪（“鑪”今通作“炉”）引出闺中哀怨，负心人已去，空余香烟缥缈的博山香炉，说明人心易改，令人长叹。六朝时人常借博山香炉的香与炉来隐喻男女之间的爱情，也见之于民谣，如谣歌《杨叛儿》中有“暂出白门前，杨柳可藏乌。欢作沈水香，依作博山炉”。亦可见博山香炉是当时日常的用品。除鲍照诗外，六朝时咏博山香炉的诗赋还有很多，今存有齐刘绘、梁沈约和昭明太子、陈傅縡等人的作品，但多是描绘香炉的华美，因而不如鲍诗借物隐喻，既富有情趣且寓意深刻。

其实，咏香炉而含隐喻，并不始于鲍诗，早在汉代已有这样的作品，如古诗中的“四坐且莫喧”一首，以“香风难久居，空令蕙草残”作为结尾，比喻世俗的人竭力追求浮名，结果好似蕙草被烧，香气很快散掉，到头是一场空虚，意似宣扬道家的思想。以鲍诗与之相比，似更具生活情趣。

古诗中对香炉本身是这样描述的：“请说铜炉器，崔嵬象南山。上枝似松柏，下根据铜盘。雕文各异类，离娄自相联。”确实很简练地刻画了汉代铜香炉的特征：在一个圆形铜盘的中央，竖立着上承炉身的直柄，炉身是上仰的半球形，以盛香料，上盖作尖锥状的山形，并开有许多出烟的小孔。盖上多雕饰精美，重峰叠嶂，鸟兽人物出没于林莽之中。使用的情景古诗中也有描述：“朱火然其中，青烟扬其间。从风入

君怀，四坐莫不叹。”由于这种香炉工艺精湛，难于制作，不是一般工匠所能胜任，故古诗中用古代的巧匠来喻当代的工师，说：“谁能为此器，公输与鲁班！”其实汉代的制炉名匠，有一位姓名还是流传下来了，那就是长安巧工丁缓。据《西京杂记》，他除能制作名贵的“常满灯”和“卧褥香炉”外，“又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为奇禽怪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丁缓制的博山香炉，今天虽已不存，但是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汉代青铜博山香炉，也颇多精品，它们应可与丁缓的作品相媲美。

西汉时期，雕镂精美的铜博山香炉，开始出现在已被发掘的王公勋贵的坟墓之中。通常使用的类型，可举在河北满城的中山靖王刘胜和他妻子窦绾二墓中的出土品为例。刘胜墓中放置的铜香炉，没有承托的圆盘，柄下有圈足，柄部镂雕成三条腾出波涛的龙，以头顶托炉身。炉身上部和炉盖合成层层上叠的山峰，虽无九层至少也有六七层，峰峦间点缀有树木，神兽、虎豹出没其间，还有肩负弓弩追逐野猪的猎手，特别是雕出一些体态灵活的猴子，或高踞在峰顶，或骑在兽背，更使作品增加了生趣。全炉纹饰均错金，线条劲健流畅，有粗有细，细的近于发丝，工艺极为精湛。若于炉内焚香，轻烟飘出，缭绕炉体，自然造成山景朦胧、群兽灵动的效果（图1）。窦绾墓中放置的一件，是下面带有承盘的，炉盖也作人兽出没其间的双重山峦，但似不



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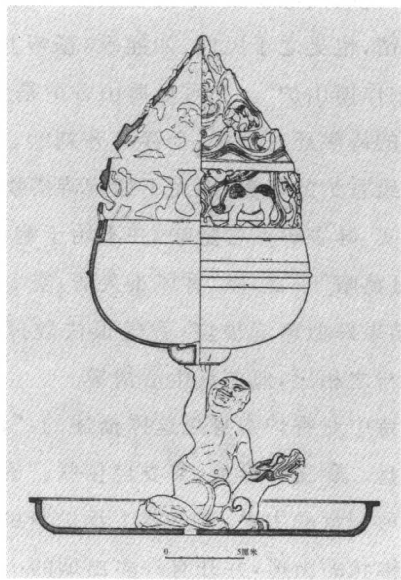


图 2

如刘胜墓的那件精巧。山峦下有一周由龙、虎、朱雀、骆驼及草木、云气等组成的花纹带。炉柄的造型最具匠心，雕出一个裸身力士，仅腰束短裤，肌肉凸张，孔武有力，他屈膝骑在仰首伏地的神兽背上，左手按兽颈，右手托奇峰耸立的炉体，造型稳重而不呆滞，确有力举万钧的气势(图2)。这两件铜博山香炉的体高分别是26厘米和32.3厘米，它不但适于在当时席地起居时置于席边床前，也适于列置帟帐之中。

另一种类型的铜博山香炉，具有较长的炉柄，体高为一般香炉的两倍以上，看来在宴会等场面中使用较为合适。这类香炉，可举从茂陵附近1号无名冢的1号从葬坑中获得的一件为例(图3)。该炉的炉身也是上仰的半球形，上盖作重峰叠嶂的山形。但炉柄极长，柄下底座镂雕二龙，蟠体仰头张口，炉柄即自龙口中上伸，作五节的竹节状，柄上端承炉身。并在柄上铸出三条曲体昂首的长龙，龙头托顶在炉身底侧。龙体鎏金，爪银色，鳞甲灵动，体态矫健。全器纹饰多鎏金银，华美异常。炉体通高达58厘米，是出土同类器物中最高的实例。炉上有铭刻，知系宫内所造，原为未央宫物，后归阳信家，当时称作“金黄涂竹节熏卢”，说明当时香炉和熏炉的名称是通用的。上面所举的实例，都是工艺精湛、只有皇室贵胄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至于一般官僚地主的用器，则形体较小，装饰也较简单，除了青铜铸造的以外，也有陶制品，一般也是由承盘、炉柄、炉身和山形有孔的尖锥状炉盖所组成，也有的在山形盖的顶峰饰一振羽翘尾的朱雀。但墓中随葬的陶质博山香炉，有些属于制工粗劣的“明器”。

魏晋时期，皇室贵胄中铜博山香炉沿用不衰。据晋《东宫旧事》，太子初拜，“有铜博山香炉一枚”；太子纳妃，“有银涂博山连盘三斗香炉一”(《太平御览》卷703)。但至今我们还没有在晋墓的发掘中，获得过精美的铜博山香炉，因此还难以说明是否与汉代博山香炉的形制有区别。南朝依西晋遗风，博山香炉仍然流行，因此才产生前述的那些咏博山香炉的诗赋和谣歌。这些诗赋中用华丽词藻渲染描绘



图3

出的博山香炉，似乎镂雕有不少颇具故事情节的人物形象。如南齐刘绘诗中说博山香炉“上镂秦王子，驾鹤乘紫烟”，“复有汉游女，拾羽弄余妍”。前引鲍照诗中也有“上刻秦女携手仙”之句，大约指传春秋时秦穆公小女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事，最后

夫妻乘风仙去。因为我们还没有获得六朝时铜博山香炉的实物，难于证实。但有些也可能是诗人的想象而非出于写实，如鲍诗首句云炉为“洛阳名工”所铸，即非写实，因刘宋时洛阳为北朝地域且当时已不再生产博山香炉了。因此诗中引弄玉萧史之典，只不过是為了以仙侶携手与情人变心相比照，而取得更好的艺术效果而已。



图 4

南朝时一般使用的博山香炉的真貌，也可以从有关文物资料中找到它的形象。常州南郊戚家山发现的南朝晚期画像砖墓中，有一块侍女画像砖。画面是一位双髻少女，长裙大履，衣带飘飞，转体举手，姿态生动，在她的左手手托有一件博山香炉，下有承盘，炉柄上托半球状炉身，上有重山形盖，山颠立一振羽翘尾的朱雀（图4）。从这一图像看，似乎南朝的博山香炉仍然沿袭着汉代的旧制。

（1986）